新民时论

改革提升老百姓的“自由度”

周锦尉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吸引着国内外人士的目光。笔者阅读时发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里,有三个“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笔者的感觉是:我们党更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人民的创造力、百姓的需求和改革成果的共享。

由此,想到了百姓的“自由度”。

新时期以前,计划经济尤其是“左”的思想影响下,百姓的“自由度”少得可怜。记得有一案例说,当时有农民在自己宅院中种棵枣树、出售大枣若干,被举报发现、批为“资本主义尾巴”,枣树也被野蛮砍去。新时期启动时,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就是意味着,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作细枝末节“小修小补”,而是作根本性的改变。从农村联产承包、不再扣“投机倒把”帽子,到政府“放权让利”、私人开个店办个厂都行、劳动者胆大的到海外发展也放行,政治禁锢的帽子大大减少,老百姓的“活路”多起来了。由此,老百姓逐步理解,改革不就是小人物干事的“自由度”明显提升吗?

恩格斯晚年,曾有一位杂志记者问及“你和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恩格斯在回答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那句著名判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的宏伟事业就是为着全人类解放的。人,就是人民群众,是老百姓。“人自由发展”的“自由”两字,告诫我们:“从人出发”,是党和政府为民办事的要义。

百姓自由度,以经济学语言来解析,简要地说,就是市场经济发育、发展,重要的在于要素流动的顺畅,这个“要素”,包括劳动者、技术、资本等,要素流动起来了,就为“优化配置”形成了前提条件。

所谓“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由市场根据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的一般规律,由市场机制通过自动调节对资源实现的配置,用“看不见的手”进行优胜劣汰。也就是前文所引论的“三个让”的前两个“让”。有了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财富增多了,就需要分配合理,利益共享,这是第三个“让”给我们的要求。

公报提及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消除“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税体制(给地方更多利益);“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放宽投资准入”(大力支持上海自贸区试点)等等,都体现着“百姓自由度”、也就是“要素自由度”的提升。

改革事业已经有35年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启动”、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商品经济体制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到如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改革主线、主调一直未变,市场取向的要求越来越清晰。改革的真谛是人的解放,是老百姓干事业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有序,生活水准越来越提高。

“埋单”问题

凌河

已晚谭

沸扬的网上报端,照例又有“官闻”曝光,这里头既有官员的“作风问题”,竟更有谁来为他的“不端”埋单的问题——这就不是区区“私德”的事儿了,恐怕有了更大的“问题”。

“埋单”问题,先是一只小“麻雀”——广东省湛江市国资委副主任冯欣,老是带女下属去宾馆“开房”。冯副主任在金海宾馆开了几年的房,每月要二三次,总是先放一笔押金,扣完后再续。这钱是谁放的呢?竟是一家企业。“所有开房费用全部由企业报销”,就是说,冯副主任的“风化”,他不掏一文钱,都由企业埋单。

冯欣当然只是一个“小巫”啦,而近日受审的原铁道部运输局张曙光张局长,大概算得是只“小老虎”了——张局长看中了一位女高音,“喜欢得不得了”,但是“包二奶”“养情人”,他也不掏一文钱。“女高音”要换车,张局长跟“老板”“说了一下”,于是“老板”给了“女高音”30万元;“女高音”逛街看中了一块名表,于是张局长“打了个电话”,“老板”又赶紧捧了50万大洋过来;至于“女高音”说一点清淡工资不够用,张局长又“安排”她当了“老板”的“形象大使”,拿三四十万,“无需做任何事”……这就是说,张曙光“喜欢女人”,却不掏自己的腰包,他养个“情人”,全由企业埋单。

其实这个“埋单问题”,并不是孤立罕见。在一些地方,官员潮吃海喝,甚至声色犬马,身边总要带个“皮夹子”,就是一个商人、一个“企业家”,不但给他安排“一条龙”,而且“全由企业埋单”,至于他的衣食住行,乃至人情往来,更是自有“市场”埋单,不必掏一文钱,所以才有了“工资基本不用”的常事。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包二奶”,与情妇钟华谈定了价格,而这1500万元的包养费,则由“企业”出,分三次交付钟华;汕头市委原书记黄志光,儿子买房,由“企业”出钱,这算平淡无奇,最要命的是黄书记“信佛”,他要烧“头香”、撞钟,钱由“企业”出,他要向寺庙捐100万元,结果这100万元,也是“企业”埋单,黄书记的大名,却刻在了佛石之上,算是他积德。这样一来,从“养情人”到“捐功德”,从“感情”到“信仰”,统统由商人“埋单”,自己不掏一文钱。

“埋单问题”是个什么问题?我们总是说,官商之间,不要“勾肩搭背”,现在有的官员和商人,却成了“拜把兄弟”,岂但是“过往甚密”,而且成了“利益共同体”,商人为官员“埋单”,甚至“全包”,在有些地方,已经是见怪不怪。其实“企业家”不是“活雷锋”,在商言商,他的每一次“埋单”,每掏一文钱,都是有“道理”的,看中的无非是官员手里那一点权罢了——比如文首两例,冯副主任“开房”,为什么“企业”甘于“全部报销”?因为他是国资委副主任,分管的又是“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你能不“埋单”?至于为张曙光张局长“埋单”的那位“企业家”杨建宇,坦言之所以给“女高音”埋那么多单,就是“希望在篮箭列车项目中获得张曙光的帮助,也想通过张获得铁路系统更多订单”,所以愿“埋单”、肯“出血”……

可见“埋单问题”,只是个表象,问题的实质,是那“一支笔”、一个“批文”甚至“一个电话”,是过于集中而缺少制约的权力呢——而这,不正是我们的改革所要解决的大“问题”么?

转基因流言

徐达内

新“传”说

转基因是绝对的“流言集中营”——这句话转发5万次我也不怕。

在中国舆论场上,有关转基因的话题完全是场混战。基于各自对粮食安全、生命伦理、风险评估的不同感受,两人就算是能在绝大多数话题上心心相印引为同道,但是,在此却往往是“子之蜜糖,我之砒霜”。

之所以会这样,我揣测,主是还是由于人类对未知的恐惧感,再加上一些转基因支持者“理性的自负”,导致反对者不得不把阴谋论当成了抵抗的武器。

11月9日,北京青年报就曾在其网站发布道歉声明,宣布该报10月31日所刊《支持转基因副部长被指受聘美国公司》一文存在不实,“李家洋副部长从未在任何场合说过‘3-5年保证转基因大米占领13亿人的餐桌’”。

想来,这家报纸道歉之时可能还会有些委屈,因为,引自原国防大学教授朱国林的这段指控,标明摘于新华网。

此外,在农业部稍早前发表的那篇《转基因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中,被点名“把权威机构已反复澄清过的所谓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等谣言拿来说事”的,同样也有新华网。

中国最有官方背景的网站之一,却出现了对高级别政府官员的“指控”,出现了农业部“孰不可忍”的谣言,这也就从侧面说明了反转基因者的能力。事实上,只要稍加搜索即可发现,在各式各样的网络论坛上,李家洋副部长早就被口诛笔伐,原因就是他曾经有过“靠转基因技术保口粮安全”等公开表态,被视作在中国这一领域的关键人物。更不用说有关转基因种子生产商孟山都“灭种祸心”的指控,那可是长盛不衰、笃信者众。

应该说,有一些反转者确实是太过急切了。且不说把“混血”说成“杂交”这样的笑话,连我个人原本颇为尊敬的崔永元先生,在专程赴美调查时也曾犯下低级失误:被他当作“各类豆子及豆腐和油没有是否转基因的标注”证据的产品,包装上恰恰就有“NON GMO(非转基因)”的标志。

当然,崔永元后来的表现还是基本配得上“实话实说”,他承诺要再去美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且采访支持转基因的一方。更重要的是,他把批评重心转移到了中国的转基因食品管理能力上。

的确,同期爆出的另外一些新闻,会让对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存有疑虑的人们愤怒:有企业用低价进口转基因菜籽油冒充国产菜籽油完成代购任务,中储粮回应承认目前无能力检测;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大昉宣称中国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已经吃过转基因食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像方舟子这样的科普工作者以及绝大部分农业专家都在支持转基因技术推广,乃至恶语相向、极尽嘲讽,但反转者也不是用一句“无知愚昧”或者“食古不化”就可以概括。哪怕真如那61名集体上书的院士所说“再迟缓就是误国”,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总是底线。

我的朋友李铁是个坚定的转基因支持者,他两年前在南方周末发表《破析中国式的转基因谬误与谣言》时的一段摘要,我想就算是坚定的反转人士,应该也会认同:“面对流行的谬论时,或许有人会痛斥民众的愚昧和国人科学素养的低下。但封闭的决策体系、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政府机构、批评声音被压制、公共信息不透明,往往才是谣言和阴谋论泛滥的温床。”

微时代,语文何以“人艰不拆”

李泓冰

余烬录

以前看科幻小说,有描写人类走到最后的情形,活脱都成了大头小身子的外星人ET,除了一颗硕大无朋的头颅,四肢已退化成如触须般细弱。据说是人的头脑越来越聪明而四肢懒而无用的缘故。

写小说的没经过现在这个“小时代”——或者说是“微时代”,否则一定知道,连思考这件事,也已沦为懒而无用了。语言文字,算是长在思考身上的羽毛吧,如今已经“微”成了140字,超过的就算鸿篇巨制了。且慢,貌似140字也快成被扬弃的“古董”了。如今流行的是更“微”的文字,甚至只是微信中懒懒的“转发”和“喜大普奔”“人艰不拆”“何弃疗”等支离破碎的“微”表达。无论多复杂的感受,晕、牛、爽、酷、囧,便可一言以蔽之,连“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之类的幼儿语言,都登得大雅之堂,“豆你玩”“蒜你狠”也成了媒体热衷的标题……

在这个背景下,本就不尴不尬的传统语文,其地位更摇摇欲坠。三年前,上海几所高校在面向理科生的自主招生中,悄悄抹掉了语文,曾引起哗然。如今,以人文学科见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则悄悄地在必修课目录上抹掉“大学语文”,又让惊惶于语文地位的舆论一片唏嘘。其实,语文从必修改为选修甚至不修,并不始于人民大学,早在七八年前就开始了,如今已有六成大学没有母语必修课。

让大家想不通的是,英语必修而语文不修。其实这也顺理成章:英语有用,在考证升学求职中能藉此一路过关斩将,而语文呢?哪个世界500强企业录你会考李白杜甫曾国藩?

光是抱怨高校数典忘祖,他们一定觉得自己冤成了窦娥。语文的地位衰微,早成扶不起来的阿斗。在任何有招生自主权的学校,别管是大学,还是中小学,语文无用都是潜规则。小学生在惨烈的小升初中想进名校,要苦练的内功是人人喊打却又战无不胜的奥数,排第二位的是英语,总还有些证能考。语文最是不济,灰头土脸地被弃若敝屣,在升学求职的路上一路走低,不但难登堂奥,连日常交际也压根无须文从字顺。高校弃修大学语文,自然让学生“喜大普奔”。

语文有多难学,让人多厌学,凡经过12年寒窗的孩子说起来都是一把泪。咱们的基础教育,生生把博大精细、优美风雅的中国语文教成了无用之学。课堂上,老师把一篇好端端的文章给肢解成零件,让学生死记硬背;碰上考试,“说说自己读这篇文章的感受”,再傻的学生都知道,真说“自己的”感受,分数必惨不忍睹,出题人在卷子后面诡笑着要你说出的,分明是“他”的感受……这样学出的语文,如同被穿了琵琶骨的武林高手,百无一用。语文高分,可能是读书极少、写作低能,如何能在招生选拔中做得重要砝码呢?

学不好、考不出、用不上——欲使语文有用,难矣哉!

有辱斯文、有愧先人的,不独是语文的被弃,它背后人文精神沦落,更让人惊心。在以课业负担之重闻名全球的中国,孩子们却根本没有自由阅读的时间和精力。阅读和写作,本来是语文学习的两大基石,也是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所赖,如今都拱手让给了概念化、功利化的应试,孩子们如何还能顺着“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步步拾级而上?

要挽救语文,得从根儿上救起。您瞧,说起语文这件事,微时代那头的孩子们,又要“人艰不拆”了……